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以凉山州为例

阿力只发

(中共凉山州委党校,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关键词: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内源性发展;凉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2-0042-07

Study 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 Case Study on Liangshan Prefecture

ALI Zhifa

(Party School of the CCP Liangshan Prefectural Committe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vigorating function and the poverty-relief sustainability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verished people in rural areas and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industries or the same industry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ults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and the theory of feasible capabilities, we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impoverished areas can better alleviate farmers out of poverty. Then, we take Liangshan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and mak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s of thre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s. We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could promote the self-initiative and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alleviating poverty better than other approaches. Based on such findings, we proposed ideas on the ways to develop quality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o rid impoverished farmers of poverty.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Liangshan region

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以来,我国的扶贫更加注重精准性、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改变了以漫灌式、救济式和外源式为主的扶贫模式,减贫的成效更加显著。2019年底全国贫困线(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计算)以下人口仅551万,但主要集中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如凉山州到2019年底还有7个县、300个村、17.8万

贫困人口,全州贫困发生率达4%^①。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贫困呈现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多样化、扶贫的边际效应递减、贫困户易返贫等特征。产业扶贫作为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从而破解脱贫瓶颈的重要举措,能够让贫困人口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脱贫致富。基于此,根据贫困人口分布及其贫困特征,立足于当地实际生产生活条件,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探寻一条符合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内源性和可持续性的脱贫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20-01-06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深度贫困彝区经济社会内生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19SX17)。

作者简介:阿力只发(1990—),男(彝族),四川金阳人,助教,经济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创新与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产业扶贫在价值链上变“输血”为“造血”,即以政府主导的“外援性”脱贫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内源性”脱贫转变。早期的贫困主要指居民收入或消费支出不足^[1],导致贫困人口的低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侧重于强调物质满足以及具有工具性作用的经济收入。因此,我国乃至全球早期的扶贫主要是救济性和外源性的,并且只考虑单一维度的收入。以经济收入为贫困衡量标准的局限在于,其导致了扶贫的“手段性”,即贫困主体只获得具有工具性作用的东西,却忽略了农户自身全面发展的“目的”。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人类基本可行能力^②被剥夺,而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2],提出了贫困是多维的观点。该理论强调扶贫不仅要关注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培养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理念中最重要的脱贫举措之一,是能力贫困理论关切的“建构主义”具体实现路径。有学者将我国的扶贫策略变迁分为广义扶贫阶段、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区域瞄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四个阶段^[3],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和“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就是扶贫“目的”的体现,其中的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即基于产业发展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挖掘其创新精神和发挥自我价值实现就地脱贫。

另一方面,产业扶贫在意识和动力上将贫困人口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早期的扶贫模式中,贫困人口是被扶持以脱贫,缺少主体性和参与性。这种缺乏主体性和参与性的扶贫,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没有得到提升^[4],对帮扶措施的满意度较低^[5],实施这种主体过度依赖政府的扶贫模式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6]。因此,森^[2](2002)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中的社会参与和刘易斯^[7](2004)提出的“贫困文化”都强调了贫困人口在扶贫中应该占有主体性地位,并有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而依托当地资源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选择适应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将极大地提高贫困者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实现长效性脱贫。

然而,区际生产条件的异质性,如何选择适应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从而长效性促进群众脱贫的观点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根据已有的研究表明,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部门增长的减贫效应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加显著^[8-10];并且研究认为,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农业增长对缓解贫困的效应更显著^[12]。研究表明,初级部门比其他任何部门的

减贫效应更显著,其增长对缓解贫困的效应大约是其他部门(制造业、服务业)的4倍。Cervantes-Godoy(2010)等^[13]从人均农业GDP、人均非农业GDP和人均汇款三个指标研究了其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表明人均农业GDP增长的减贫效应最大,其减贫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50%。其次,研究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布局,对缓解贫困有重要作用^[14-11]。但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第一产业尤其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分配效率相对较低^[12],农业需要更长的资金周转期,以及更容易受到冲击^[13];并且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效率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生产率大约是其2倍^[18]。因此,其对GDP的贡献随着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9],不利于总体经济增长。此外,非农业部门的一些细分领域如交通运输业、贸易等的减贫效应也很大,甚至超过农业部门^[20]。因此,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三产融合发展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极其重要,也表明了协调发展对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性。

虽然农业对GDP的贡献有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生产规模将继续扩大^[21],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主要的减贫手段之一^[23](世界银行,2007)。农业部门保证了社会的生存^[16],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24],并向现代部门提供廉价食品和低工资成本劳动力^[25],不重视对农业部门的公共投资,将会大幅度增加贫困发生率^[26]。从某种程度上看,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前两个部门^[27],通过产业链的关联性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农业部门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减贫作用^[28]。并且研究指出,全球75%的贫困人口都分布在农村,其中大多数依靠农业相关经济活动和外出务工来谋生,在中国和印度等转型国家中,贫困人口过度集中在乡村,甚至占到其国内贫困总人口的82%^[24]。可知,农业生产作为基础性工程,其生产增长对农户家庭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农业价值链地位在深度贫困地区得到凸显。

由于产业扶贫有资源和市场导向性、适应性、灵活性、多样化等特征^[3],各贫困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政策和制度等差异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特定地区在如何布局产业结构、如何选择特色产业以及以何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基于农业产业的发展实现长效性脱贫提供了

研究空间。基于凉山产业发展的实际条件以及上文的综述,本文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与可行能力理论相融合,从新的视角构建产业发展助推农户实现脱贫的分析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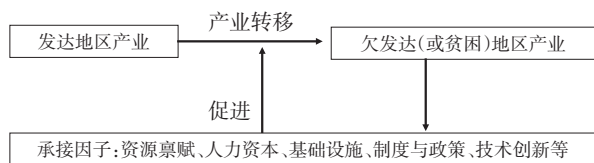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梯度转移助推农户实现脱贫的分析框架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从一个长生命周期来看,每个产业将会随着其产业发展要素的变化,尤其是技术创新活动,经历创新—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然而,技术创新活动往往集中于高梯度(或发达)地区,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迁,增长较为缓慢、经济效益较低的产业将从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但这种转移的发生基于低梯度地区必须具备基本的承接因子,即区域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积累、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制度和激励政策、技术创新能力等一系列条件。因此,产业转移往往是从经济中心向邻近的城市外围转移。凉山州虽然资源禀赋优越,但平均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技术创新活动,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不能较好地承接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因为产业转移不能局限于转移过程是否发生,更重要的是转移后发展“好不好”。其次,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逻辑,人们将其拥有的资源转换为可行能力集的过程中,将受到个体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凉山州从目前实际来看,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技能水平等较低,如果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出现职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造成结构性失业问题,最终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农业产业的发展不仅让农户充分参与,通过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三、凉山州农业产业扶贫面临的新瓶颈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的大力推进下,凉山州扶贫模式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造血式”的扶贫。因此,产业扶贫成为助推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推进农业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还面临一些新的瓶颈。

(一)农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加,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凉山彝区农业发展最重

要的制约因素。首先,凉山州以农村人口为主,2018年末总人口为529.94万,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96%^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占比高。其次,农业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2013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41,同年四川省的平均值为8.13;技能劳动力比例为2.88%,同年四川省平均水平为7.13%^③。最后,由四川省和凉山州的劳动生产率比较可知(图2),2005—2017年间,虽然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与四川省整体平均水平相比一直都相对较低,且随着时间推移劳动生产率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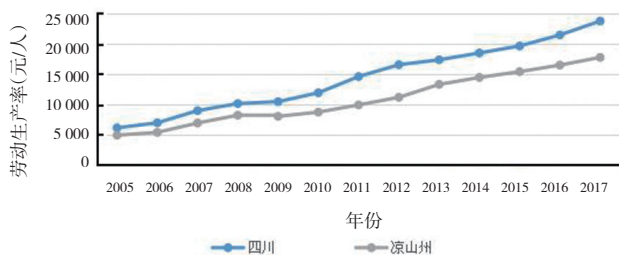


图2 四川省与凉山州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图^④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推进,凉山州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农业技能的培训,开展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和农业技能培训。2017年印发通知,要求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该工程实施以来,全州共投入3.8亿元资金,分批次对全州13万亿贫困户进行全覆盖培训,累计培训贫困人口10万余人次^⑤。但由于贫困户文化程度较低,农业技能培训课时短等原因,培训质量有待提高。

(二)缺乏高产品种引进,并且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首先,高产品种存在适应性不确定风险,农户对新品种的引进具有一定的抗拒性。农村居民习惯于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生产下生活,为了保证安稳的生活,他们对新品种种植接受意愿不强。但是经多年种植的农产品种,不能较好地抵御害虫以及农作物病害,种植成本增加,农民的实际收益下降。

其次,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农业技术,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例如,近年来,西昌市发展葡萄产业,种植面积达10万亩,投产面积约5.5万亩,总产量达15万吨。但是由于存在大棚搭建不科学、栽培管理不规范、冷链运输不足等问题,使葡萄的品质下降^⑥。2018年《四川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凉山州2017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为504.5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为277.25亿元、23.12亿元、197.72亿元和6.14亿元。农业总产值占

第一产业总产值的54.96%,占比超过第一产业总产值的一半。但其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仅为 170.95×10^3 公顷,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04%。近几年在昭觉和布拖等县开始发展大棚蔬菜,但是仅局限于小面积种植,经营效益还有待提高。

最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运输成本高,导致产品不仅“没有”,而且难“走出去”。到2017年底,凉山州区域内只有成昆铁路一线,运行的高速公路只有213公里,远低于四川省324.81公里的平均水平^⑦。大部分村在精准扶贫的推进下才通车,但凉山地区的地理属性,以及部分村通公路质量不高,导致交通经常阻断,维护成本非常高,使季节性农产品或易腐农产品无法参与市场交易。

(三)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以家庭农业为主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土地细碎化,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一是凉山彝区尤其是在偏远贫困山区,没有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即使举家外出务工,家里的土地只能以较低的租金租给亲戚或邻居,甚至让其荒废。二是耕地面积小,土地细碎化,尤其是海拔较低的丰产区域,每家农户只有2~3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区域,使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增加,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三是农产品购销机制不健全,小规模生产经营、高成本运输费用、缺乏相关产业链、购销渠道落后等,使外部市场需求与内部产品供给产生极大的缺口。

近几年,各地区着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农业合作社等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造血功能。在2015年以前,由于资金短缺,凉山地区集体经济“空壳”现象严重,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政府出台《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指导意见》,并采取“支部+专业合作社+技术能人+贫困户”等模式,每个村投资不少于50万元扶持资金,以发展集体经济。据统计,全州集体经济“空壳村”从2956个减少到521个,有3224个村已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545个村集体经济已达标^⑧。但是以龙头企业+农户、股份制合作等组织化程度高的农业经营模式没有得到较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还远远不足。

(四)政策性资金瞄准度较低,追求指标增长

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集调研考察、统筹资金、组织管理、监督反馈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在产业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任何环节都必不可少。而实地调研考察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产业项目实施可行性的验证环节,例如农业产业发展前期的测土配方、新品种的适应性检验等。首先,凉山地区存在

不同程度的调研考察不深入问题,导致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选择的特色产业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最终降低了政策性资金的瞄准率。其次,在产业扶持基金管理使用中还存在一些管理混乱、发放不及时、未建专户等问题^⑨。产业项目的发展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组织管理机制,造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问题,重投入、轻产出,重硬件投入、轻思想观念的转变等现象^[29]。

四、实证研究——凉山州农业产业扶贫效应检验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归纳和梳理已有文献,根据Janvry & Sadoulet (2010)和Cervantes-Godoy (2010)的观点,即农业部门实现的人均GDP增长能够显著地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以剔除价格变量后的第一产业增长率(x_{1t})、第二产业增长率(x_{2t})和第三产业增长率(x_{3t})为自变量,以贫困深度(p_{it})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1),以检验农业产业的发展是否对贫困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

$$p_{it} = \alpha + \beta_1 x_{1t} + \beta_2 x_{2t} + \beta_3 x_{3t} + \varepsilon_t, \quad (1)$$

式中, p_{it} 表示贫困深度,值越大,贫困程度越深; α 表示截距项, β_1 、 β_2 、 β_3 分别表示各产业增长率的弹性系数, ε_t 表示随机误差项。

区域贫困深度的测定可以使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的积累数据大小做出判断,但目前没有统计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数据,所以利用平均收入水平以下区域的收入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衡量,为了得到一个无量纲的数值,再用其除以全体居民人均收入^[30]。

$$p_{it} = [(1 - \alpha_i) d_{ir} + \alpha_i d_{ic}] / y \quad (2)$$

$$d_{ir} = \begin{cases} I_r - I_{ir}, & I_{ir} < I_r \\ 0, & I_{ir} \geq I_r \end{cases} \quad (3)$$

$$d_{ic} = \begin{cases} I_c - I_{ic}, & I_{ic} < I_c \\ 0, & I_{ic} \geq I_c \end{cases} \quad (4)$$

I_r 、 I_{ir} 分别表示全省和全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I_c 、 I_{ic} 分别表示全省和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_{ir} 、 d_{ic} 分别表示全州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贫困深度, α_i 表示凉山州城镇人口比重, y 表示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由于凉山州总体上属于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且为进一步对不同产业的减贫效率比较分析,在模型(1)中有第二、三产业的数据。因此,基于实际以及数据对应,在贫困测度中加入城镇居民相关数据。

(二)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 2000—2018 年的相关指标数据对凉山州贫困深度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相关数据来自《四川省统计年鉴》和凉山州统计公报,并以 2000 年为基期,经过不变价格调整。

(三)回归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不稳定性,在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时,需要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于非平稳性时间序列,一般可通过差分方法来消除单位根,再利用其进行计量分析。为了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虚假回归和趋势伪消除等问题,需要对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包括 DF 检验法、ADF 检验法以及 PP 检验法。相对于 DF 检验方法,ADF 检验法在检验中加入了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高阶差分项,从而分为三个模型进行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本文运用 Eviews9.0 软件,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中的模型二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通过表 1 可知,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平稳过程,表明这些变量都满足 I(1)过程,并且 P 值都很小,说明效果很好。

表 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一阶差分变量	检验形式 (C,L)	检验数值	P 值	R ²	DW 值	结论
Δx_{t1}	(C,1)	-5.46	0.000 4	0.65	2.02	平稳***
自变量 Δx_{t2}	(C,1)	-3.30	0.030 7	0.41	2.06	平稳**
Δx_{t3}	(C,1)	-4.50	0.003 0	0.73	2.00	平稳***
因变量 Δp_{it}	(C,1)	-5.55	0.000 3	0.65	1.50	平稳***

注:Δ表示各变量取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L)字母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的常数项和滞后阶数;***、**、*表示数据检验通过了 1%、5%、10%显著性水平。

当所有变量都是同阶时,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以下将继续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及 OLS 回归

为了检验两个均呈现一阶单整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Engle 和 Granger 于 1987 年提出两步检验法,也称 EG 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成多变量的 Engel-Granger 检验,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线性组合关系。通过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确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多变量的

Engel-Granger 两步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其检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C,L)	检验数值	P 值	R ² 值	DW 值	结论
ε_t	(C,1)	-2.55	0.013 8	0.013 8	1.97	平稳**

注:ε_t表示 OLS 回归后的残差;其他同表 1。

从表 2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残差=-2.55 小于临界值-1.96,拒绝原假设,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即为平稳序列,且服从正太分布,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而可以对该模型进行估计。本文采用 OLS 对所建立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p_{it} = -0.112 + 0.022x_{t1} - 0.00x_{t2} + 0.016x_{t3}$$

拟合优度(R²)为 0.5,说明拟合效果较好,F=5.3,F 统计量值不大可能是由于限于运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不够长,但是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Prob(F-statistic)=0.01,小于 0.05,说明总体上回归模型和结果有效。从回归模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三次产业的增长对贫困的缓解作用不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正向作用,但第二产业可能对贫困具有强化作用。原因首先是凉山彝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不能充分参与第二产业经济活动;其次可能是贫困深度指标计算测量的是相对贫困,贫困人口不能充分参与第二产业经济活动,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必然会拉开贫富差距,贫困深度将会增加。2)由回归系数可知,第一产业的增长对凉山彝族贫困缓解作用比第二、三产业大,约为第三产业的 1.4 倍。这主要是因为凉山州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比大,而服务业分布很少,如餐饮、服装、娱乐等产业很大部分并非为内源性发展的结果。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以及修正误差,以下将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建立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建立各变量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根据 Granger 定理,可以建立以下误差修正模型:

$$\Delta p_{it} = \alpha + \beta_1 \Delta x_{t1} + \beta_2 \Delta x_{t2} + \beta_3 \Delta x_{t3} + \text{ecm}_{t-1} + \varepsilon_t, \quad (5)$$

其中,Δ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ecm_{t-1}表示滞后一期的残差,ε_t表示随机扰动项。由表 1 的检验可知,各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过程,可直接进行回归。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 OLS 回归,其回归结果为:

$$\Delta p_{it} = -0.008 7 - 0.001 5 \Delta x_{t1} - 0.000 4 \Delta x_{t2} + 0.001 5 \Delta x_{t3} - 0.212 2 \text{ecm}_{t-1}$$

拟合优度(R^2)=0.56,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F=4.5$, F 统计量不显著,但其 P 值为0.015,小于0.05,回归结果有效。从回归的结果来看,由于产业发展自身具有的长期性,在短期内三次产业的减贫作用很小。但总体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凉山彝区的贫困具有缓解作用,而第二产业发展则具有强化贫困深度的倾向。其次,短期内服务业对贫困的缓解作用相对于第一产业有上升的趋势。滞后一期的残差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存在-0.2122的修正力量使贫困程度在下期向均衡值靠拢。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可知,凉山彝区农业产业的发展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更能有效地缓解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其中农业产业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是第三产业的1.4倍,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的贫困深度。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内部制约因素,凉山地区农村居民基本可行能力低,如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水平低等,导致其对可获取资源转换效率低,降低了其增收和盈利能力。二是社会环境等外部制约因素,人们在将其可获取的资源转换为各种功能性活动以实现自身福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制度安排、技术创新等;凉山深度贫困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等,不仅制约了当地产业的发展,还对较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形成了约束,导致对高附加值产业承接失败。基于凉山地区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下提出几点建议:

(1)提升农户的基本可行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深度贫困地区农业劳动者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组合能力低,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实现劳动者增加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因此,加强高质量的农业劳动技能培训,从而“实质性”地提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的能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防止贫困人口落入“粮食自给合理陷阱”的重要保障。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高产品种和灌溉技术。首先,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的基本前提条件,农业机械化发展不仅能节约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产出的规模效应。其次,打造高质量的交通网络。便捷的交通条件是联结农村农业与农业产品市场的纽带,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只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但不能参与市场交换,必然不能带来利润。最后,引进高产品种和灌溉技术。高产品种的引进,能够增强防御害虫,降低购买农药等农业生产成本;而灌溉技术缓解了农产品生产高度依赖气候条件的现状,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确定性经济风险,从而增加农业的内源性增收能力。

(3)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打造利益共同体。政府要因势利导,激励发展以龙头企业+农户、股份制合作、组建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化经营程度高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提升农户主动参与经济活动,实现自主发展脱贫。创新拓展农业产业扶贫的“五力模型”^⑩,因地制宜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体,不仅能盘活农村土地和构建农产品购销机制,还为深度贫困地区“三产融合”发展提供新机制,强化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条^[31]。凉山贫困地区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产业,缺少组织化程度高的经营模式,特别是龙头企业+农户型,能够为贫困地区农业经营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这是目前凉山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短板之一。

(4)发挥政府服务性功能,防止“公地的悲剧”再演。在扶贫过程中,政府主要起顶层制度设计、监督和引导作用,但地方政府“权利主义多作为”和“形式主义不作为”并存现象常见^[3,32],服务型政府职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因此,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制度的顶层设计,有力执行与加强监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公地的悲剧”是公共品的性质所引起的结果,扶贫中有公共品投资短缺,不重视生态环境等现象。诸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研发投资、选准特色产业、生态环境与农业耦合等问题,都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支持和引导。凉山州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较差,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发挥政府的服务性职能,防止“公地的悲剧”再演,是高效的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内源性增收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 《闻令而动,凉山7县发起最后总攻》,《四川日报》,2020年3月16日。

② 基本可行能力是对于一个人可行的、有能力去“实质性”实现的一系列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功能性活动组合包括健康、营养良好、医疗保障、接受教育和培训等一系列建设性活动。《凉山州2018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2014):25-36。

- ④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
- ⑤ 数据来源:钱翔.《凉山“智志”双扶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凉山日报》,2019年10月28。
- ⑥ 数据来源:《集思广益解决葡萄滞销问题》《凉山日报》,2019年11月13日。
- ⑦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2018》。
- ⑧ 数据来源:《全方位提升脱贫攻坚引领力》《凉山日报》,2019年10月24日。
- ⑨ 资料来源:《督察产业扶持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凉山日报》,2019年11月2日。
- ⑩ 五力模型指政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等多方联结体。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R].中国农村贫困标准.1990.
- [2]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贻,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3] 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4):99-107.
- [4] 陈恩.产业扶贫为什么容易失败?——基于贫困户增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87-95.
- [5] 邢伯伦.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的调查[J].财经科学,2019(5):71-80.
- [6] 郭立平.精准扶贫的内生矛盾与改革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8(9):10.
- [7] 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廷亮,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107.
- [8] CHRISTIAENSEN L J, DEMERY L. Down to earth: agriculture and poverty in africa[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 [9] DE JANVRY A, SADOULET E.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 25(1):1-20.
- [10] 张萃.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5):51-63.
- [11] 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1):78-89.
- [12] RAVALLION M, CHEN S.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2(1):1-42.
- [13] CERVANTES-GODOY D, DEWBRE J.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for poverty reduction[J]. 2010.
- [14] 钟甫宁,叶春辉.中国种植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原则和模拟结果[J].中国农村经济,2004(4):4-9.
- [15] 张志新,张秀丽,白海洋.基于要素资源配置视角的贫困地区“产业项目扶贫”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9(1):14.
- [16]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7] COLLIER P, DERCON S. African agriculture in 50 Years: smallholder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3: 92-101.
- [18] GOLLIN D, LAGAKOS D, WAUGH M 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11:11-14.
- [19] BYERLEE D, DE JANVRY A, SADOULET E.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Toward a new paradigm [J]. Annu. Rev. Resour. Econ., 2009, 1(1): 15-31.
- [20] DOROSH P, THURLOW J. Beyond agriculture versus non-agriculture: decomposing sectoral growth-poverty linkages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9: 440-451.
- [21] CHRISTIAENSEN L, MARTIN W. Agricultur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Eight new insights[J]. 2018.
- [22] CHRISTIAENSEN L, DEMERY L, KUH1 J.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 239-254.
- [23] World Bank.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7b.
- [24] KAYA O, KAYA I, GUNTER L. Foreign aid and the quest for poverty reduction: Is aid to agriculture effective?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64(3): 583-596.
- [25] JOHNSTON BF, MELLOR J W.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566-593.
- [26] MWASAGUA P M, ODONDO A, NYONGESA D. Public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J]. 2018.
- [27] TIMMER C P. Agriculture and pro-poor growth: An Asian perspective[J]. 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Development, 2008(5):1-28.
- [28] MELLOR, J W. Faster more equitable growth-agriculture, employment multipliers and poverty reduction[M]. Agri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Project Research Report 4, Cambridge, MA. 2001.
- [29] 尹梦霞.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连片开发扶贫模式的思考——以“大小凉山彝区”的普格县为例[J].特区经济,2012(5):134-136.
- [30] 冯艳.区域贫困测度、识别与反贫困路径选择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5(11)。
- [31] 陈希勇.山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来自四川省平武县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6(5):87-90.
- [32] 蒋永甫,莫荣妹.干部下乡、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案例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5):162-168.